

# 从“北人南迁”的视角探析南宋泉州港的兴盛

杨哲<sup>1</sup> 肖雅婷<sup>1</sup>

(1.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 昆明 10691)

**摘要:** 从北宋末期起, 泉州港迅速发展成中国三大海外交通港口之一。宋廷南迁和大规模的北民入闽对泉州港之发展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首先, 偏安于江南一隅的南宋政府相比于前朝更致力于发展海外贸易, 其各种鼓励外贸的政策措施推动泉州港的对外贸易不断向前发展; 再者, 大规模的北方移民正是推动泉州港海外贸易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度过了初期的人地压力之后, 福建的农工商业与泉州港的外贸发展都从移民中受益匪浅。

**关键词:** 南宋; 泉州港; 海外贸易; 兴盛原因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353

## 引言

南宋时期的海外贸易, 在中外关系交流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泉州港是南宋时与广州港、明州港并称的中国三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在隋唐以前, 泉州港对外贸易的发展并不显著, 直至唐代中期, 泉州才渐渐发展成为一个海内外商人汇集的都会。到北宋时期, 由于统治阶层实行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以及社会经济的良好环境, 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 到了南宋时期, 泉州港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相比于唐朝、北宋时期强劲迅猛了许多, 在南宋初年, 泉州港的对外贸易已获得同两浙路同等的地位, 到了南宋中后期泉州港的地位已经与广州港不分伯仲。直至元朝时期, 泉州港的发展正式超越广州港, 在国内是名副其实的首位对外贸易港口, 在国际市场上也是著名的世界性商贸港口。

纵观泉州港的发展历程, 笔者认为泉州港的发展之所以在元朝能达到顶峰, 这与其在南宋时期的积累密不可分, 泉州港的发展在唐中期到北宋时期一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上升趋势, 但在南宋时期的发展速度确是十分强劲迅猛、势如破竹。为何在南宋时期, 泉州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取得如此强劲迅猛的发展? 南宋时期泉州港海外贸易兴盛的背后究竟有哪些关键原因? 对于泉州港兴盛原因的探讨, 学术界已多有讨论, 成果颇丰, 例如周中坚认为宋代泉州港的兴起是由于当时阿拉伯商人所经营的海外贸易在东南亚需要一个大的港口, 而港口的位置恰好在泉州地区得到了平衡和统一<sup>[1]</sup>; 戴显群认为唐宋之际泉州港贸易的发展, 主要是由于唐末五代泉州相对稳定的环境和当时福建经济的发展<sup>[2]</sup>; 庄景辉将元代泉州港繁盛的原因归结为蒲寿庚弃宋降元保全泉州城、元朝政府对海外贸易的积极态度以及元初泉州所处的特殊政治军事地位<sup>[3]</sup>。学界讨论的结果归纳起来主要包括这几点: 泉州长期稳定的发展环境、便利的对外交通、政府重视海外贸易、造船与航海技术发达、国内外销售市场广阔、城市商业化、商品经济的发展等等, 在此不一一赘述。

如上所述, 对于泉州港兴盛原因的探讨, 大多数的学者是将宋元两朝并立讨论<sup>[4]</sup>, 对泉州港的发展做一个较长时段的观察, 或者是只重点讨论最鼎盛的元朝时期, 但却忽略了泉州港发展的冲刺阶段——南宋时期这一特殊阶段的讨论。再者, 学者们讨论的视角多集中于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社会环境、水陆交通等方面, 但笔者认为, 除了上述等原因, 南宋时期泉州港的对外贸易能够取得如此迅速且强劲的发展还有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即宋室南渡和大规模的北人南迁。经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乱后, 宋室政权南移至临安, 大规模的北方人口也随之南迁到南方各地, 其中, 由于福建地区久未受战乱影响, 成为了移民争相前往的乐土, 福建也在这一时期迎来了人口增长的高峰, 在此之前闽中从未涌入过如此大规模的北方移民。

**作者简介:** 杨哲(2003—), 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肖雅婷(2002—), 女,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通讯作者:** 杨哲

人口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人口的结构、数量、质量、迁移等内容关乎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首当其冲的便是占传统经济主导地位的农业生产;再者,人口对古代经济的手工业、商业贸易也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甚至于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还需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统治政权也南移至江南一隅,在传统社会里,政治权利对中国经济的作用是无孔不入的,宋室南渡对当时整个南方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其中也包括对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综上所述,本文将尝试梳理这样一个问题:从“北人南迁”这一视角出发,探析南宋时期统治政权南移以及底层群众南迁入闽对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和影响。

## 二、宋室南渡---推动泉州港海外贸易发展的主导力量

宋代的海外贸易,是在宋王朝严格控制下进行的。统治阶层的态度及其所实行的政策对海外贸易的兴衰都有着直接的影响。经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后,逃到江南一隅的南宋阶层,面对着赋源比北宋少,但军费等各项开支却与日俱增的情况,紧急的财政问题迫使统治者在这一时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增加财政收入,维持其国家财政的运转,这其中也包括重视发展海外贸易,以此获取巨额的市舶收入来缓解其财政问题。

相比于北宋政府,南宋统治者采取了更多的措施致力于发展海外贸易。绍兴年间,宋高宗曾下诏:“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出于对海外贸易的重视,南宋统治者大力鼓励民间商人和海外商人来华贸易,颁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对外贸易的政策,在此列举两条代表性的举措:第一,积极招徕外商,对促进海外贸易有积极贡献的华商和外商予以官职。绍兴六年(1136年),知州连南夫奏云:“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sup>[5]</sup>。”后来又规定,“闽广舶物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次推赏。”大食商人蒲罗辛和泉州的纲首蔡景芳,都曾经因为贩入各种海外宝货以及招商有功而补官承信郎。第二,宋政府每年设宴犒劳外商,外商有在华居住权和贸易权,外商的财产、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权利也受到保护,并有入学、入仕的机会。南宋统治者对来泉州通商的阿拉伯人,为他们专门设计了居住的“蕃坊”。在这些侨商的聚居区,他们甚至建立了学校,有了所谓的“蕃学”之称。桑原鹭藏在《蒲寿庚考》中说:“有宋一代,阿拉伯人来华互市者多,侨居各港埠,或于城内与华人杂处,或居有宜所,谓之蕃坊,泉州蕃坊在州城之南,即泉南地临晋江,便于出海,故置蕃坊于此。”《方輿胜览》也记载道,泉州“土产蕃货,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致象犀、玳瑁、珠玢、琉璃、异香、胡椒之属。”当时有大量的阿拉伯人在泉州经商定居,现今泉州已经出土了200多方阿拉伯墓碑,这上面的石刻是研究历史时期中阿经济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

诚然,宋廷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确实对泉州港的发展起到了强大的助推作用,除了政策因素的加持,部分南宋皇室迁至泉州也为泉州港的发展提供了助力。宋金战争的不断摩擦,导致建炎初年南宋皇室的一大宗支---南外宗正司迁至泉州躲避战祸,据史料记载:

“(建炎三年)甲午皇叔右监门卫大将军眉州防御使知南外宗正事士樽,言自镇江募海舟载宗子及其妇女三百四十余人至泉州避兵,乞下泉州应副请给,许之。于是秘阁修撰知西外宗正事令广,亦自泰州高邮军迁宗子等百八十人至福州避兵<sup>[6]</sup>。”

大批的皇室宗室纷至沓来,宗室子弟不仅干预市舶事务,更有宗室成员担任市舶官员的记载,杨文新在其论文《宋代市舶司研究》中就总结道:“有25位宗室曾经担任过市舶官员……其中广南东路7人、两浙路4人、福建路14人。”这些宗人在任期之内,大多遵守且实行南宋政府颁行的鼓励外贸的政策,都为招徕外商和泉州的海外贸易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还需注意的一点是,与宗室子弟同时相伴的还有“士大夫避难入福建”。因此,泉州在这一时期聚集了一个颇有规模的消费阶层:他们主要由皇室成员和部分官僚士大夫组成,是最具实力和财力的奢侈品消费者,这为泉州进口的香药犀角、珠宝百货等奢侈品提供了很大的消费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泉州港对外贸易的发展。

然而,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宋金战争和宋廷南迁对国内的各个港口造成的影响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各港口的海外贸易也呈现不平衡发展的状态,其中受宋金战争影响较为明显的是两浙路的港口,建炎三年至建炎四年金兵两次进入江浙地区,劫掠两浙诸港,“所过燔灭一空”,杭州、明州等港口遭到严重破坏。金兵北撤后,南宋王朝为防备金兵从海上北来直捣两浙,特地在明州等贸易港口设立水兵屯驻,且经常强征民间海船充当兵船,这使两浙诸港的对外贸易又更加的举步维艰。毋庸置疑,宋金战争和宋廷南迁对两浙诸港口的海外贸易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 响,但是反观泉州港,由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宋金战争中成为了南宋统治阶层后方避风港的存在。这样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形势,实际上给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利的条件,最为直接的影响即是使得泉州港相比北宋时期更加靠近政治中心,这也同时意味着泉州港更加靠近海外进口的香犀珠宝等货物的消费中心。

南宋时期,临安作为都城,已经是一个人口众多、消费能力最强的特大城市了,并且临安聚集了规模最大的奢侈品消费群体:整个南宋皇室、庞大的官僚集体以及众多的富商大贾;临安的大街小巷都有蕃货销售,《梦粱录》里记述有“犀皮铺”、“珍珠市”、“香药社”等商铺,都是经营进口商品的专门店铺和市场。很多商人“于泉、广蕃名下转买已经抽解胡椒、降真香……往临安府市舶务住卖。”因此,泉州港作为这一时期没有受到战争破坏且外贸一直向前发展的对外港口,成为了满足临安市民以及统治阶层对海外舶来品的消费需求的重要商品来源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宋廷南迁对泉州港发展所起的作用主要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南宋统治者实施的一系列鼓励华商和外商对外贸易的政策,对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发展起到了强大的主导作用和助推作用,统治者的鼓励政策就像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操控着外贸发展的方向,推动泉州港的海外贸易不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南宋政权南移至临安以及部分宗室成员南迁至泉州,都为泉州港的进口商品提供了规模颇大的消费群体和巨大的消费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泉州港对外贸易的发展。

### 三、北民入闽——推动泉州港海外贸易发展的动力阶层

#### (一) 人口增长带来的负担与红利

上文已有谈到,经靖康之乱后,宋室政权南移至临安,大规模的北方人口也随之南迁到南方各地,其中,由于福建地区久未受战乱影响,成为了移民争相前往的乐土,福建地区也在这一时期迎来了人口增长的高峰。短时期内大规模的北方人民涌入福建对当地的影响有利亦有弊,一方面短期内人口的急剧增长会对土地造成极大的负担,尤其是福建境内山多田少,相比于江南,耕地的面积较为有限,移民最初亟待解决的问题即是粮食问题;另一方面人口的急剧增长也为当地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促进了福建地区的开发,对福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都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甚至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福建部分地区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并且推动了当时福建境内最大的港口——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发展。如上所述,在这一部分,笔者将从北民入闽的角度出发,阐述移民初期的人口增长情况,以及大规模北方人民涌入闽中为福建和泉州港带来的负担与红利。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两宋以前由于前朝多次战乱的影响,已经有中原人口陆续地涌进闽中,使福建部分地区的人口得到一定程度的增长,并且促进了福建经济的发展,到了北宋末年,由靖康之难引起的大规模移民入闽,不可避免地对福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更加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宋史·钦宗本纪》记载,“河东威胜、隆德、汾、晋、泽、绛民皆波河南奔,州县皆空。”于是有“士民扶老携幼,适汝、颍、襄、邓避难者莫知其数。”据吴松弟推算,靖康之乱大约导致了500万人口南迁,由此可见移民规模之大<sup>[7]</sup>。据宋初《太平寰宇记》载全闽总户数达到46万户,比唐朝元和年间翻了6倍,到了南宋绍兴三十二年,闽中户数为1390566,口数为2808851,分别比北宋元丰初年增长33%和37%。到了嘉定十六年,福建户数和口数分别达到了历史性的1599214和3230578,又比绍兴三十二年增长了15%。这一时期福建人口急剧增加,但同时期内,福建耕地却不可能像人口的增长幅度那样保持相同的比率,尤其是福建境内山多田少,相比于江南,耕地的面积较为有限。因此,人口与耕地,人口与粮食生产之间的比例失衡成为必然。

短期人口的暴增迫使福建农业需要及时自我调节,南宋时福建地区解决人稠地狭的方式有两种,其一是开垦新地、加强精耕细作以提高粮食产量;其二是争取不到土地的人民只能转变谋生的方式,将多余劳动力转移至其他行业,例如手工业和商业。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泉州港经过北宋时期的发展,对外贸易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并且海外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吸引了许多过剩的劳动人口投身出口商品的生产,例如丝织品、瓷器的生产;本身已经占有土地的农民,受海外贸易的影响,为获取利润,在种植粮食的同时也会进行甘蔗、荔枝、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生产。笔者认为人口压力虽然在南宋早期给福建地区造成了人多地少的严重矛盾,但也迫使福建的经济进行自我调节,多余的劳动力寻求到了新的谋生方式,诸如投身手工业和商业,尤其是受当时外贸利润的影响,众多劳动人口投身当时海外市场所需的出口商品的生产 and 经营,为海外贸易提供了相比北宋时期数量更多、品质更加优良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这极大程度的推动了港口贸易的向前发展;因此,大规模的北方移民进入福建,实质上是推动泉州港海外贸易发展的内生动力,渡过了初期的人地压力,福建的农工商业与泉州港外贸发展都从移民中受益匪浅,下文笔者将从农业、手工业两方面展开论述,讨论在南宋时渡过了初期的人地压力的福建地区农副产品与手工业品的发展对港口贸易的促进作用。

#### (二) 农业的发展

移民初期为了缓解人口迅速膨胀所带来的粮食问题,当时的福建人民加紧扩大耕地面积,积极开发农业资源,改善水利灌溉条件。由于福建整体的地形是背山面海,所以人民扩大耕地的方式大体上分为两种,其一是向山林争地,即在山区开垦营造梯田;其二是向江海要田,即沿江沿海开辟滩涂、围垦良田。因此,在南宋时,邵武军境内呈现“由高下百叠”的景色,而建宁府、南剑州则出现“田数百级阶”的壮丽图景,可知当时梯田已遍及高

山峻岭。在沿海平原地区，由于人民的辛勤耕作，东湖、南湖相继退水复耕，泉州、福州等沿海地区终使大片盐碱地变为良田，获耕地“殆千余顷”。在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作用下，福建地区的耕地面积都得到较大规模的扩大，水利灌溉系统有全面的改善，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得到提高。靖康之乱时期福建境内由于人口急剧增长造成的粮食供应不足问题，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到了南宋时期终于得到了较好的缓解：建宁府、邵武军、南剑州、汀州、漳州的粮食供应通常可以自给自足，如果遇到米产不足的年份，可以靠地域内的土产得到补充；福州、兴化军、泉州的粮食供应会较为不足，因此这三个地区为了确保粮食需求，会较为依赖从外地特别是两浙和广南一带输入米谷。

在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福建地区的耕地面积都得到较大规模的扩大，水利灌溉系统有全面的改善和兴修，不仅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得到提高，农副产品的质量和产量也得到提高，尤其是诸如甘蔗、荔枝、茶叶等经济作物。福建地处亚热带，气候是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雨热同期，光照和降雨量都很充足，最适合于种植木棉、桑麻、甘蔗、荔枝、茶叶等亚热带作物。其中，木棉和桑麻的种植大大的促进了福建棉织业和丝织业的发展，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笔者将在下文手工业部分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在此部分，笔者将主要探讨在南宋时期福建人口急剧增加的背景下甘蔗、荔枝等代表性经济作物的种植与港口贸易的联系。

甘蔗往往加工成蔗糖后再输送到港口进行贸易，蔗糖是泉州港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之一。蔗糖的外销情况可见于《诸蕃志》等书，主要外销对象有占城、真腊、三佛齐、佛罗安，马来西亚西岸等国，大致上包括印支半岛、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因蔗糖有一定的外销市场，所以种植甘蔗比生产粮食能得到更加丰厚的利润，“窳蔗糖为霜，利当十倍。”且大量的移民进入福建开垦到了新地，因此相比于前朝，在南宋时期有更多原本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的农民兼营甘蔗的种植与加工，甚至于出现了专门种植甘蔗和制糖的糖霜户：“糖霜户治良田，种佳蔗，利器用，谨土作一也，而收功每异。自耕田至泝瓮殆一年半，开瓮之日或无铢两之获，或数十斤，或近百斤，有暴富者。”甘蔗的种植对于精耕细作的要求很高，但由于蔗糖获利较为丰厚，蔗区也在不断的扩大，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田耗于蔗糖”，“岁运入淮浙者，不知其几千万坛，蔗之妨田固矣。”等现象。由此可见，蔗区的不断发展已经导致部分地区出现了蔗粮之争的矛盾。

除了蔗糖之外，荔枝也是泉州港对外贸易的主要农副产品之一。宋代四川、广南都有出产荔枝，但荔枝的生产 and 出口都以福建为盛：“南闽荔枝名四方”，“闽中所产比巴蜀南海尤为殊绝。”荔枝销路良好，极受欢迎，“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其东南舟行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故商人贩益广，而乡人种益多，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由此可见，荔枝的销路较广，外销需求也很大，因此荔枝外销所带来的丰厚利润也促使许多争取到土地的移民进行荔枝的种植和经营，并且为了获得更大的贸易利润，各家种植者们不断创新，加强优质荔枝的生产，形成了良性的竞争关系，因此相比于前朝，南宋时期的种植者们培育了不少新品种，例如陈紫、方家红、游家紫、宋公荔枝、蓝家红、周家红等优良新品种。除了培育新品种，种植者们还留意到荔枝保质期短，因此人们又对荔枝进行加工，使之能较为长期的贮存，若是长途泛海贸易亦不容易腐烂损坏，例如用红盐法将荔枝制成荔枝脯，这样加工的荔枝“三四年不虫，修贡与商人皆便之。”另有日晒法，以“烈日干之，以核坚为止，蓄之瓮中，密封百日。”加工中还添加辅料制成各种风味，如丁香荔枝等。通过各种加工方法，人们将荔枝做成荔枝脯、荔枝干、荔枝蜜等贮存期较长的产品，更有利于运销海外。优良品种和荔枝加工成品的出现更进一步的促进了南宋时期福建荔枝对外销售的增长，荔枝的对外贸易也因此长盛不衰。

综上所述，南宋时期福建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它们的发展表明原先较为单一的粮食生产体系已逐渐向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体系过渡，农业由原先自给自足的状态向商品化的方向迈进。它们生产的扩大以港口外贸的需求为条件，反过来又极大的促进了港口贸易的发展和繁荣，其中，移民的大规模加入为两者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支撑：一方面，大规模的移民入闽开发了更多的农业资源，例如耕地的扩大和水利的兴修，为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生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大规模的移民也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投身于经济作物的生产和经营，众多的种植者形成了良性的竞争，促进了新品种的不断出现和农副产品的加工，不仅保证了港口对外贸易的货源供应，也为海外市场提供了更丰富更优质的出口商品，从而促进了海外市场的扩大以及泉州港港口贸易的持续兴盛。

### （三）手工业的发展

在手工业经营这方面，上文已有谈到经济作物中的木棉和桑麻的种植大大的促进了福建棉织业和丝织业的发展，在这一部分笔者将主要探讨在南宋时期大规模北民入闽的情况下福建棉丝织业、制瓷业等代表性手工业的制造与港口贸易的联系。

中国的棉丝织品历来深受海外人民的喜爱，因此棉丝织品的出口规模在手工业品中占比很大，虽然棉丝织业只是作为农村的家庭副业所存在，但对外贸易所能获取的丰厚利润，以及大规模移民的增加，致使福建诸州郡相比于前朝时有数量更为庞大的农家妇女投入了棉丝织业的生产，并能织出具有地方特点的花色品种。泉州港对外

销出的棉丝织品主要包括布帛两类，布类即是包括棉布、麻布等各种布匹，南宋时期由泉州港运销海外的布类，主要包括：青布、印花布、红布、五色布、青白土印布等等。上文已有谈到，福建的气候适合于种植木棉，木棉的大量种植为布类的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上述外销的各色布类，均为福建及泉州本地所能出产，《泉州府志》有载：“绵（棉）布即吉贝为之，七邑俱有，苧布，即青山苧，有用糯糊烈日中抽过而织之曰糊布；又有夜露日晒，其色自白曰白纱布。”至于染制各色布匹的染料，据《八闽通志》所载：“蓝淀、紫草、红花，以上三种蓝、紫、红染料，诸县皆有。”

帛类即是丝、绸、绢、缎等丝绸产品的总称，南宋时期从泉州港运销到海外的丝绸品种有：白丝、南北丝、绸绢衣、细绢、五色绢缎、花色宣绢、青皮单锦、建宁锦等等。上文已有谈到，福建气候适合于种植桑麻，桑麻的种植为蚕桑事业和丝织品的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上述所列举的各种外销的丝绸产品，查福建方志的记载，大多数是为福建本省各地所能生产的产品。如《八闽通志》所载：“泉州府有土绢，俱出晋江、南安、同安三县；又建宁府土绢，俱出瓯宁、浦城二县。”以及“红绿锦出建阳，今有濯锦桥。”《闽产录异》所载：“福州所织绢，薄者名灯纱，厚者名厚绢。”《寒秀草堂笔记》有载：“泉州有本机素绫、花绫，漳纱之属。”当然，缘于移民带来的先进的丝织工艺以及港口贸易所带来的利润，促使这一时期福建地区的棉纺织技术在不断提高，“百工技艺敏而善仿，北土缁纛，西番毳罽莫不能成。”尤其是泉州地区，在吸收了北方丝织工艺的同时，又继承了江浙一带的丝织技术。南宋建炎三年因战乱，宋廷将原本主管国家纺织的“南中正纺织司”从江苏镇江迁至泉州，该机构的迁移直接把当时先进的蚕桑纺织技术带到泉州，苏颂《送黄从政宰晋江》诗曰：“泉山南望海之滨，家乐文儒里富仁。弦诵多于邹鲁俗，绮罗不减蜀吴春。”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在海外市场需求的刺激下，以及大量移民的增加，致使福建诸州郡相比于前朝有数量更为庞大的农家妇女投入棉丝织业的生产，相比于北宋时期，南宋时的福建棉丝织业得到了更加蓬勃的发展，同时棉丝织技术和产品质量的提高不仅为泉州港的对外棉丝织品贸易提供了充足的货源，也进一步推动了棉丝织品对外销售的增长。

中国的瓷器历来是在海外贸易中久占鳌头的大宗贸易品，每年都有很大的外销量，在早期制瓷业是以北方为盛，但瓷器容易破碎，陆路长途运输既不方便，运费和损耗也会影响利润的收入，在海外市场的需求下，福建地区利用优越自然条件，就地取材烧造陶瓷，以供泉州港启运外销，这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因此瓷器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吸引了众多的商人和劳动人口投身于瓷窑的建设和瓷器的生产。在两宋以前，福建制瓷业的发展并不显著，但到了北宋中后期，福建的制瓷业已经开始兴起，直至南宋时期，由于大规模的北方移民入闽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加之海外贸易的不断刺激，导致福建的制瓷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和发展。今天在宋泉州、兴化军范围内发现有唐五代窑址 18 处，发现宋元窑址 137 处，在闽北、连江、福清、闽侯、厦门及闽西等地也有宋元窑址的发现。

在福建的众多窑场中，外销规模最大的窑场当属德化窑，其生产高度发展，目标主要瞄准国外市场的需求，所以生产的瓷器一方面着眼于外销实用的生活用品，一方面迎合国外宗教信仰所需而生产大量带有浓郁宗教色彩的器物，主要以碗居多，其次有军持、壶杯、瓶、碟等。还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时景德镇创烧的青白瓷以质量优渥著称于世，这一名瓷博得了海外的青睐而作为贸易瓷行销亚洲各国，由此青白瓷成为当时国际市场的畅销。国外这样喜爱青白瓷，于是德化窑的工匠们便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资源和有利条件，不失时机地大量制造生产青白瓷，以适应这一特殊需要。由于德化窑青白瓷的大量外销，在海外多个国家的古代墓葬和遗址中都留存了它们的痕迹，流传在各国博物馆中的传世品也不少。最近几年来，根据国外调查发掘出土的资料看，南宋时期德化窑生产的各类瓷器，在东南亚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均有较多的发现；在印度、日本、伊朗、阿拉伯以及东非沿岸等国家也有出土德化窑的瓷器；在非洲的肯尼亚以南的坦噶尼喀境内出土了德化窑的青花瓷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德化窑生产的早期白釉器，在菲律宾群岛的古文化遗址中出土数量最多。1964 年以来，在菲律宾发现数千件比较完整或能够复原的德化窑古代瓷器，其中以马尼拉圣安娜贝湖西端的内湖的加莱港等遗址最为集中。

福建的古外销瓷，曾在中国制瓷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福建众多窑场的工匠为当时瓷器的大规模对外输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在生产发展的过程中，十分注意研究各国人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不断对瓷器的釉色、造型、装饰进行设计，使之尽量投合海外消费者的要求和爱好，因此其产品始终得以在国际市场上销路大开，这不仅促进了当时泉州港海外贸易的日益兴盛，更重要的是持续向海外市场打响了“中国名片”，传播了中华文化。

如上所述，南宋时期福建地区的棉丝织业和制瓷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当然，除了以上列举的两种手工业，南宋时福建地区的其他手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诸如造船业、铜矿业、造纸业、印刷业、煮盐业等等，在此不一赘述。这一时期手工业得到全面发展的底层逻辑与经济作物扩大生产的逻辑是一致的，它们的发展以港口外贸的需求为条件，反过来又极大的促进了港口贸易的发展和繁荣，其中，移民的大规模加入为两者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劳动力支撑和技术革新：一方面，大规模的移民入闽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福建的众多手工业诸如制瓷业、造船业、铜矿业、煮盐业等工序复杂，每一行业都需要众多的工匠才能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出口商品，大量的移民涌入无疑为上述的手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支撑；另一方面，大量的北方移民和江浙移民带来了先进的丝

织工艺和制瓷工艺,推动了棉丝织业和制瓷业在技术上的革故鼎新,不仅保证了港口对外贸易的货源供应,也为海外贸易提供了种类更多品质更优的出口商品,从而促进了泉州港海外贸易的持续性发展。

##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泉州港之所以在南宋时期能有如此强劲迅猛的发展,宋廷南迁和大规模的北民入闽在其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首先,偏安于江南一隅的南宋政府即是港口贸易的掌舵人,统治阶层的态度及其所实行的政策对海外贸易的兴衰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南宋统治者相比于前朝更致力于发展海外贸易,并颁行实施了一系列的鼓励政策,其各种政令措施就像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操控着外贸发展的方向,推动泉州港的海外贸易不断向前发展。

再者,大规模的北方移民即是促进港口贸易持续发展的续航者,底层的移民群众虽然身份卑微,社会地位边缘化,但是他们数量众多,并且各司其职,正是他们的存在构成了这个社会的支撑,为福建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的支持和技术上的革新,不仅使得原先较为单一的粮食生产体系逐渐向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体系过渡,农业、手工业由原先自给自足的状态向商品化的方向迈进;并且促使福建沿海地区形成了农副产品生产、手工业生产与海外贸易相结合的产业链条,从而促进了海外市场的扩大以及泉州港海外贸易的持续性发展,为元朝时期泉州港成为梯航万国的世界性商贸港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参考文献:

- [1]周中坚. 古代泉州港兴衰史浅探 [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1, (4): 70-76.
- [2]戴显群. 唐代福建海外交通贸易史述论 [J]. 海交史研究, 2000, (2): 8.
- [3]庄景辉. 略论元代泉州的繁盛及其原因 [J]. 东南学术, 1989, (1): 45-50.
- [4]吴泰, 陈高华. 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和泉州港的兴衰 [J]. 海交史研究, 1978, (1): 12.
- [5]脱脱. 宋史 12 [M]. 宋史 12, 1977.
- [6]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 [M].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 2013.
- [7]葛剑雄. 中国移民史. 第五卷, 明时期 [M]. 中国移民史. 第五卷, 明时期, 1997.

# An Analysis of the Prosperity of Quanzhou Port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rtherners' Migration to the South"

Yang Zhe<sup>1</sup>, Xiao Yating<sup>1</sup>

<sup>1</sup>*School of Ethnology and History,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1069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 Quanzhou Port had rapidly developed into one of China's three major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ports. The relocation of the Song court to the south and the large-scale migration of northern people into Fujian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Quanzhou Port. First, compared with previous dynasties, the Southern Song government, which had taken refuge in a corner of the Jiangnan region, was more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overseas trade. Its various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encourage foreign trade continuously promoted the growth of foreign trade at Quanzhou Port. Furthermore, the large-scale northern migration served as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trade at Quanzhou Port. After weathering the initial pressure of population on land, both the agriculture,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Fujian and the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of Quanzhou Port benefited significantly from the immigrants.

**Keywords:** Southern Song Dynasty; Quanzhou Port; Overseas Trade; Reasons for Prosperity